

# 前新时期文学中的浩然评价

刘晓红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针对浩然在前新时期文学研究中的过分意识形态化问题,文章尝试从文学作品的细读和体验出发,从集体精神、青年理想、农民语言等几方面解读剥离政治话语后的浩然小说的文学魅力,凸显浩然文学研究中文学性阐释的有效性,丰富浩然研究及评价的客观性,以期进一步深化浩然研究。

**关键词:**文学性;集体精神;青年理想;农民语言

**中图分类号:**I26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3-0151-03

在当代文学里,几乎很难找到像浩然这样一生保持和主流文艺政策共进退的作家了。在前新时期文学创作环境里,即17年和文革文学时期,没人能像浩然这样在党的文艺政策规束下如鱼得水般地写作。这就构成对浩然创作评价的最大困惑,即究竟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评价浩然小说?

提到浩然,几十年来只有两种态度,要么极力否定,要么部分肯定,且全都是围绕政治话语展开的论说。浩然何以成为17年到文革农村小说的一面旗帜?作为一个极具“样本”意义的作家,浩然在文学上的成就究竟该如何评价?怎样有效解释浩然小说剥离政治意识形态后的文学魅力?这些问题至今都悬而未决。回顾浩然研究,50年来很少有人真正从文学本身谈及浩然,甚至连最起码的艺术性都很少被关注,比如表现手法、结构支撑、语言特征等。对于一个有极强文学天赋的作家,仅仅从时代因素考证他的成功是片面的,倘若没有足够的文学造诣,浩然不可能借时代的风帆在众多农村小说中脱颖而出。即使脱离政治,回到文学本身,浩然作品依然能带给读者诸多丰富的文学感受。出于个人阅读感受,我认为评价浩然,也必须从文学体验本身出发,回到其特定的历史时空,在一个农村题材占据重要创作比例的时代里论及浩然。

从作品出发,本是文学研究的基本素养,可如今对于浩然这类和政治意识形态靠拢的创作,评论者很难跳出意识形态去看作品本身写得怎样。以《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为例,无论是《艳阳天》里秋后麦收分粮还是《金光大道》里反对发家致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从经济学角度看,无非是采用单干还是合作化以谋取最大经济利益的两种生产手段而已,只不过在特殊时代下,作家借“走哪条道路”的政治化问题演绎农村的生活故事。否则仅从政治解读文学,我们无法解释当时不读书报的妇孺农民也成为浩然小说钟爱者的原因,相信当时爱读浩然小说的大众,不是寻着小说里时事政治而去的,他们并不关心萧长春、高大泉是不是合格的马克思、毛泽东主义者,也不关心无产阶级怎样战胜资产阶级,他们只是被曲折的故事,生动的人物,贴切风趣的语言所吸引。而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一开始就聚焦作品显现的政治性,不断忽略文学最

收稿日期:2010-09-12

作者简介:刘晓红(1981-),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本质的艺术性问题,我们没有更多地思考浩然的创作为什么较之其他农村合作化小说更能满足时代的需求。虽然无法成为超越时代的厚重作品,但也是当时的优秀之作。那么究竟它好在什么地方?

正如笔者一开始提到的,浩然创作虽涉及农村合作化等政治经济问题,但这些都不是衡量文学优劣的尺度。作为新中国写农民的作家,他不具备超越时代的气度,但他写出了自己的感受,写出了不同于知识分子作家对农村的体会,即使知识分子有着比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却没能写出比浩然更吸引当时读者的农村故事,这是为什么?除了众所周知的浩然具备知识分子缺乏的农村生活的丰厚积累以外,笔者认为他的创作打动读者的根本因素从未被关注。拨开政治阶级斗争情节表层,浩然的农村小说里其实构造了一个民间传统夺权与反夺权的故事。无论《艳阳天》或是《金光大道》,真正吸引读者阅读心理的是马之悦、冯少怀之流渴求权力与萧长春、高大泉之类单纯为集体谋福精神之间的矛盾对立故事。这个矛盾以各种形式演绎在中国由古至今的社会里,自古就有官场夺权之争,今天社会仍然有以权谋私的官员与一心搞好本职工作、为自己所在集体谋福的好领导的争斗。马之悦和萧长春换着外表,出现在不同时代的社会中。实际上,“走哪条道路”在浩然作品里带有一种虚幻性,就萧长春或者高大泉式的农民人物的政治水平而言,无法说他们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者,我们认可的不是他们的政治素养有多高,魅力在于这个人本身,他们不是为个人谋私的农村干部,他们一心想着怎样搞好农业社。抓住主人公的这点魅力就是小说真正打动人心之处!现在我们无法对那个时代的政治做评判,但任何时代都有勾心斗角的人,也有为集体无私谋利的人,这种人性的矛盾和斗争是可以脱离政治存在的,无论什么意识形态性质的社会,都有这样的人性矛盾,如《水浒传》里高俅一类人和宋江一类人,这两种人性构成社会生活永恒矛盾。事实上,浩然作为一个作家而非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可以大谈创作中的政治理想,但作为小说家写作时,尤其遇到激动人心的情节时,激动他的是集体情怀下萧长春式人物的道德美善力量。作家在《口述自传》里提到:“在所有作品中,我最偏爱《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和《艳阳天》一样,当时读者就认为我写二林、彩凤这样的中间人物写得好,但我不喜欢他们。今天,经历了这么多人世纠纷,对这种有点自私,但无害人之心的人是否比较理解了?但不,我

还是不喜欢自私的人。我永远偏爱萧长春、高大泉这样一心为公,心里装着他人的人,他们符合我的理想,我觉得做人就该做他们这样。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sup>[1]</sup>我们相信一个弥留之际的老人对自己创作的最后告白,多年以后浩然依然为作品里心有他人的主人公落泪,可以想象当时奋力书写中的他,是多么激动这类人物。这就是文学创作的魅力。浩然的作品虽没有超越时代,却让人愿意读,也喜欢读,别的作家写的合作化没有他写的合作化小说读者多。他的农村小说好在哪里?就好在他写了人性斗争,真诚地称赞天下为公、和谐美善的美好人性。这是任何时代文学渴求的人性内核。既在一定程度上剥离政治意识形态,又在根本上触动了文学的人性美,这是浩然作品依然能打动我们的原因,这就是文学。

读作品,就该从文学性评价作品,什么是文学性?怎样依据文学性评价作品“写得怎样”。“写得怎样,指的是艺术表现力以及造成的表达效果,即作品在怎样的程度上体现了难以用其他形式传达的语言艺术的力量”<sup>[2]</sup>。刘纳先生此言可谓一语中的,切中肯綮。以艺术表现力和表达效果作为文学性评价尺度,浩然的创作有生辉的理由:他的作品富有的内在艺术感染力是打动读者的另一个根本因素。这种内在艺术感染力是什么?通过阅读,我认为是浩然大部分作品时时洋溢出的一种年青人为理想、为共同目标而团结努力、真诚奋发的喜庆气。集体主义精神在浩然作品里,不是一句纯粹的标语口号,或者某种政治话语宣传的注释,它切实可感,读着让人由心而生振奋感和喜庆气,是一股蕴含为理想而共同奔跑的蓬勃气质。还是那句话,研究文学,就应从文学出发,细心体会哪些地方触动了自己的阅读感受。虽然浩然抒发的集体主义精神不可避免带有政治宣传色彩,可在写得怎样方面,浩然用小说有效地证明了他的文学性。翻阅《艳阳天》、《金光大道》,在虚晃的阶级斗争故事背后,令读者激情可感的不是阶级斗争的惊天动地,而是萧长春们为坚守某种生活理念而共同奋力的激情与愉悦,不管他们坚守的理念在当时和如今有何种评价,哪怕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激情,无论什么时代,年轻人的蓬勃奋斗总是令人振奋的。从现代五四开始,青年一代觉醒,为民族振新,奔走相告;新中国,同样有一群青年人披星戴月、万众一心为改变旧制度,创造前所未有的新生活奋发,这种朝气属于人类本性,在不同时代、不分政治意识形态的闪亮着它的光芒。浩然小说里体现出的

这种年轻生命热忱,成为剥离时代意识形态,依然打动人心的优质文学特质之一。从深层阅读感触而言,浩然的这类长篇完全可解读为青年人自我理想,青春奋斗的故事。每个时代,都有年轻人独有的热血抛洒途径,五六十年代青年人选择了为天下而公的理想,并为之付之挚诚。尽管时代变迁,从不同立场对他们的理想,我们有着个人见解,但心灵深处,我们无法否认青年人为理想而奋发的生命本能。于此,浩然用小说语言艺术证实了他的文学感染力,这也是浩然小说依然具有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

从文学性观看一个作家的创作,语言感受分外重要。虽然仅有三年级文化水平,靠自学成才,浩然却有着极好的文学语言天赋。好的故事须配以好的语言,才有充足吸引读者的理由。阅读浩然作品,时刻可感清新、质朴、口语化的语言。怎样评价浩然的语言艺术,除了细读文字,还得提出他的语言意义:在践行大众化,去除知识分子文艺腔方面,浩然在新文学语言本土化方面有自己的创新。在描写农民方面,五四文学以来的小说家有普遍的“通病”,即“写不像”。新文学与农民语言的隔阂成为40年代解放区文艺重点克服的问题。从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开始,这一时期语言大众化(农民化)第一次广泛而自觉的进入新文学,对中国文学语言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浩然接续在新文学农民语言方向取得突破。五四以来的文学语言都有欧化痕迹,在浩然的笔端,我们不得不惊叹他的独特贡献,木弓就指出,“读《艳阳天》,我是非常震撼的。因为这部最具有时代精神的长篇巨著中居然看不到中国文人文化影响的痕迹,也看不到西方哪怕古典知识分子文化影响的痕迹,只有彻头彻尾的充满民间文化的泥土气息,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在今天,这种

写作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当年的浩然,居然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文本。他用纯粹民间的文化改造了已经非常知识分子化的长篇小说形式,并创造了在一个封闭时代才能实现的适合农民阅读的艺术表现形式”<sup>[3]</sup>。这段评论已经充分说明了浩然在语言上对新文学的贡献,进一步讲,浩然的语言意义在于他开辟了另一个不同于五四知识分子写作的“艺术语言意识形态表达”文本,即农民口语、民间俗语巧妙融合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表达中,三种不同路数的语言奇妙融合在一个文本中,既满足大众文学趣味,又符合国家意识形态,他创造出不同于五四知识分子的语言表达方式,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学语言本土化。

怎样有效解读和评价浩然前新时期创作的文学魅力,是评价浩然及创作的关键。评价浩然,借助特定时代的政治话语是必要的,但可惜大部分研究者始终跳不出政治意识形态,始终纠结于历史、政治等外围视线,始终不愿进入文学本身来评价浩然。文学说到底还是阅读体验的问题,是人与人,读者与作者进行心灵对话的过程,进入文本内部,我们才真正与浩然进行心灵对话。所以围绕针对浩然的是是非非评价,只有走进文学内部,在人与人的心灵对话中,体会哪些感触了我们,又是什么打动了我们,这才可能是说清浩然的基本尺度。

#### 参考文献:

- [1] 郑实. 浩然口述自传[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238.
- [2] 刘纳. 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J]. 文学评论,2005(4):20-31.
- [3] 木弓. 关于浩然的一点随想[J]. 新闻与写作,1997(10): 27.

## The Evaluation of Hao Ran as a Problem in the Literature Prior to the New Period

LIU Xiao-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P. R. China)

**Abstract:** The excessive ideological approach in the research of Hao Ran is one of the problems in the new period. Aiming at this problem, this essay seeks to interpret Hao Ran's literary charm in a way of stripping off the political discourses behind his novels. Starting from close reading and experience, this interpretation will focus on several perspectives: spirit of collectivity, ideals of adolescence, and farmers language. In this way we will illustrate the validity of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in the studies of Hao Ran and give a fullness account of the objectivity of studies and reviews of his texts, hoping it could bring the studies of Hao Ran to a more profound stage.

**Key words:** literariness; collective spirit; youth ideal; farmers language

(责任编辑 胡志平)